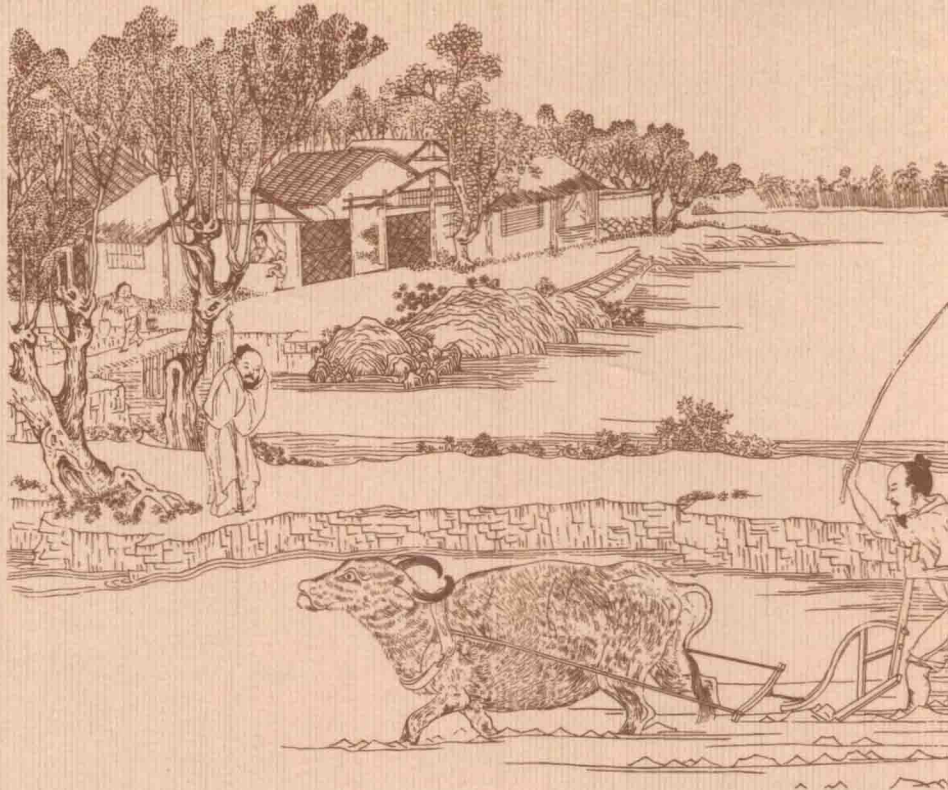


唐云松◎著



过密化背景下的市场作用

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阻碍因素研究
(1900—193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唐云松 著

过密化背景下的市场作用

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阻碍因素研究
(1900—193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密化背景下的市场作用：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
阻碍因素研究：1900~1936 / 唐云松著. —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 - 7 - 5520 - 0683 - 4

I. ①过… II. ①唐… III. ①长江三角洲—农业现代
化—现代化建设—影响因素—研究—1900~1936 IV.
①F3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5914 号

过密化背景下的市场作用

——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阻碍因素研究(1900—1936)

著 者：唐云松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3.5

插 页：1

字 数：16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683 - 4/F · 201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理论和方法	1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10
第二章 过密化趋势的表现	14
第一节 亩产量与劳动力密集度	14
第二节 过密化与农家收入	25
第三节 过密化与农业生产力	29
第三章 过密化背景下的市场作用	39
第一节 求生还是逐利	39
一、“生产率”的局限性	40
二、传统经济学模式遇到的麻烦	48
三、市场和人口的双重影响	53
第二节 带着桎梏的冥冥之手	56
一、农业生产整体的价格背景	56
二、价格、产量和科技	75
三、农村市场性质对农业的影响	94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农村的商品经济	106

一、农村市场结构	106
二、商业资本的作用	117
三、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民	132
 第四章 农业生产中的地租和赋税	143
第一节 生产成本中的地租	143
一、地租对农民的剥削	144
二、公平租额	150
三、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生活水平的比较	153
四、租额过高阻碍了农民获得地权	155
五、地主在生产上的落后性	159
第二节 赋税的征收方式和农民的税费负担	164
一、经纪型赋税系统与农民负担	164
二、农民负担的加重趋势	172
三、税费过重阻碍了农业转型	181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没有完成的农业现代化	192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理论和方法

近现代的长三角地区农业具备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发达、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市场比较成熟、劳动力身份自由。在西欧，譬如英国，农业的现代化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长三角地区农业却始终在传统和现代的边缘徘徊，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至今仍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研究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有关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阻碍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一般而言，大陆学者多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分析农业的落后原因，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界则多强调中国社会结构对西方冲击的惰性反应，关注农村商业化和西方冲击的积极作用。大致说来，研究者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

因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兴趣，历史学家喜欢从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制度结构、技术特征来论述传统农业的性质。而本书所论述的传统农业则纯粹是一种经济概念——采用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定

义：“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①——主要关注市场和人口对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对于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社会契约关系的变化等问题，则不进行论述。

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注意抽象原则的做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对于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学的关系，在一百年前经济学家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奋起捍卫经济学独立地位的那场论战中，剑桥大学经济学教师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论述，“经济史使人们懂得了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的限制条件。它要求我们注意经济环境特点的变化，它说明，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调节经济现象的那些原则也在发生变化”。^② 但“理论知识，即过去所建立的与经济现象有关的一般性命题，会告诉历史学家什么样的事实可能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经济现象极度复杂，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现象需要研究，某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完全有可能被我们所忽视”。^③ 所以，“为了解释经济现象，对经济理论的某种熟悉是十分必要的，历史学家的视野里必须有理论”。^④ 一百年后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又在开始反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了，理论界的沧海桑田耐人寻味。巴勒克拉夫认为历史学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间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⑤ “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

①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页。

② [英]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著，党国英、刘惠译：《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③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185页。

④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196页。

⑤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①但他同时认为这种历史学“必须是富有科学精神并且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的历史学”。^②同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一样,经济史研究也因为缺乏科学性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新经济史学’根本缺乏限定性和明确性,只不过是‘容忍对那些早该被埋葬的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③从增强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咄咄逼人的渗透,不一定是坏事。

本书在分析长三角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时,试图用经济学上的一些理论进行阐释,使用了“过密化”、“价格制度”等概念。“过密化”概念是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对爪哇水稻生产高度集约出现的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一种称谓,“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动力,‘内卷’(即‘过密’——引者)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④格尔兹是位文化人类学家,主要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出发理解印尼经济,指出传统产业制度与城镇化的力量,可能造成农业过密化发展,阻碍西式现代化经济的成长。^⑤他指出了阻碍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现象。

黄宗智先生使用“过密化”概念分析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黄先生的概念与格尔兹的不完全一致。黄氏强调劳动日的生产率,“过密化”指的是边际生产率递减。这种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②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3页。

③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69页。

④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⑤ 王铭铭:《“格尔兹文化论丛”译序》,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分析方法可以揭示传统集约农业效率低下的一面,但由于生产率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所以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明显。比如,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小农场,它的劳动日生产率不一定比劳动力不过剩的大农场低,因为当农民意识到劳动日不能带来产出时,就不会再愚蠢地增加单位耕地上的劳动日数量,所以劳动生产率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小农场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① 舒尔茨对以“劳动生产率”概念研究农业生产进行了批评,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有时是不可靠的。^②

本书使用“过密化”概念,是为了强调家庭农场的人口压力。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农场不能像现代化的农场一样,解雇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人口的增长就会导致家庭农场经营中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产生。本书所使用的“过密化”是家庭农场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而不是边际生产率递减。在具体的研究中,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符合小农农场的实际经营状况,能准确地反映小农农场的人口压力。格尔兹使用的“过密化”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概念上的伸展性,它可以从具体的经济分析方法,延伸到特定的文化现象: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度模式。^③ 杜赞奇正是在此意义上将“过密化”概念引入国家政权在基层的扩张中,提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认为“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内卷化’(即‘过密化’的另外一种译法——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求生还是逐利”中的相关论述。

②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8页。

③ [美]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引者)”。^① 黄宗智先生提出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也是一种“过密化”现象,但“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概念,更能反映传统家庭农场的人口压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落后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是否大量剩余?这个问题即使在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中也存在激烈的争论。W. 阿瑟·刘易斯认为存在人口过剩,“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其余意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增多,产出也不会增长了”。^② 他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指出:农业中有一些工人对生产没有作出贡献,尽管这些工人在一年里干了许多活,但并没有使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所增加,因为这种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属于“零值”的劳动力是多余的。舒尔茨对这种零值农业劳动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学说的主要根源是一组通过玩弄花招而形成的错误的统计估算(这种花招认为,农业似乎可以组织所有农业工人全年每天干十小时活,当然要除星期日与假日)”。^③ 但舒尔茨实际上只反驳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而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落后国家的农业不存在人口压力。在实际生产中,当农民意识到追加劳动不再能带来产出时,就会停止劳动日的追加,所以,刘易斯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是不正确的假设,在这一点上,舒尔茨的反驳是有道理的。但对于一个家庭农场而言,它无法解雇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多余劳动力,在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场生产中“闲人”就会越来越多,尽管劳动日的产出不会为零,但每个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却减少了。假设土地、资本等生产要

① [美]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66 页。

② [英] 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01 页。

③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51 页。

素以及科技水平接近,劳动力素质相同,一人种一亩地与三人种一亩地的产量相同,那么后者的劳动力肯定是多余的。在1900—1936年的长三角地区农村,同一地区、生产条件相似的大农场和小农场的亩产量非常接近,而小农场单位耕地上的劳动力数量要远超过大农场,这就说明小农场确实存在劳动力的剩余。这可以与阿瑟·刘易斯对印度农业劳动力剩余的计算相对照,在尽可能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后,刘易斯认为:“在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作这种计算时,用犁和耕畜种植100英亩谷物(不包括稻谷)所需要的劳力大约为14到20人。印度目前每耕种100英亩土地,有偿从事农业的人约为27人……印度的农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力超过需要。这等于约有2000万人长期失业;所以这种现象时常被称作‘隐蔽的失业’。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少见,而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却屡见不鲜。”^①

舒尔茨举1918—1919年印度流感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农业产量随之下降的例子,证明落后国家并不存在大量的多余劳动力。^②但人口大量死亡对生产要素的影响可能不仅是劳动力数量减少,人口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另外,其他的生产要素,比如农场生产中资本的投入可能也因灾害而减少了。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导致长三角地区人口的大量死亡也曾带来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但这是合乎经济学原理的现象。在传统农业生产中,人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的增长在一定阶段会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人力的不足则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这是历史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传统农业中,即定自然资源(土地)上的劳力和资本的投入肯定会产生效益递

① [英] 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3页。

②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6—61页。

减的情况。当人口的增长(这是农场经营者控制不了的)超过了农场的实际需要时,那么农场中就会出现多余劳动力。所以,人口大量死亡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并不能说明剩余劳动力不存在。

何炳棣先生认为:“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依靠当时能够运用的技术水平,中国人民对中国本部的土地利用可能是已经接近极限了。即使在长江流域内地和汉水流域这样新开发的山区已出现了农业报酬递减规律。”^①对于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何先生认为似祸非祸,“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减少似祸而非祸,因为它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重新调整她的人口与土地资源”。^②对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供给问题,何先生在时间和地域上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我们可以假定,到嘉庆五年(1800)前后土地的供给可能还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四川的移民和长江流域高地、汉水流域的开发大概正是对十七世纪晚期和整个十八世纪人口增加的反应。到十九世纪前半期,中国内地似乎到处都面临人口对土地资源日益增长的压力,但长江流域最为严重。只有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才能给中国一次暂时的喘息,以便调整她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的机会。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东北开始吸收成百万的华北农民。东南亚和新大陆为东南沿海地区的过量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尽管从长远来看,这些迁移都有利于中国安置她日益增加的人口,但中国的人口——土地比率似乎每十年就变得更加不利,仅太平天国后长江下游地区例外。

①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② 《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第157页。

随着对外移民已实际停止,东北已基本充实,现在中国与日俱增的人口将主要依靠工业化和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来维持了。^①

我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长三角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报酬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卜凯和田忠中夫的调查资料表明,大小农场的亩产量非常接近,而大小农场单位耕地上生产要素的投入,除了劳动力不同之外,资本相差不大,所以劳力的边际产出递减非常明显。黄宗智、何炳棣诸位先生认为人口压力对中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在研究中,我使用了“农场”概念,而不是使用张履鸾先生在翻译卜凯作品时使用的“田场”。实际上,这两个词的英文单词是一样的,都是 Farm。传统的家庭农场,是一种小农经济单位,同现代的农场企业有不小差别。使用“田场”,也许能突出小农经济单位的特殊性,但从经营角度看,无论是小农的家庭农场,还是现代化的大农场,都具有相同的属性。卜凯对“田场”的定义为:“指场主所耕种或管理的土地之总计。田场乃场主及其家属的生活之主要来源。”^②而在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家庭农场”概念,体现了高层对农业现代化的深刻认识。职能部门对“家庭农场”的定义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③本书在引用原始统计资料时,如果资料中为“田场”,则保持不变。简言之,在

①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

② 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田场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页。

③ 《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2/14/c_114676080.htm

本书中,“农场”和“田场”为相同概念。^①

最后,还必须对文中所使用的“现代化”一词进行一些界定。“现代化”的含义很丰富,但无论是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方面还是在思想、道德、文化方面,现代化进程应该具备不同于“传统”的理性化、效率化等特点。艾恺认为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擅理智(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以这两个特征为基础,“现代化”可定义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②这个定义的优点是,只强调现代化的客观过程,避免了对现代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于现代化是祸是福的争论是无穷无尽的。本书所使用的“现代化”概念,比艾恺的定义更为狭窄,仅局限于经济、技术层面,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③

本书研究时段大致起于清末新政实施,迄于抗日战争爆发。从1901年清末新政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经济以较高速发展。清末新政意图建立较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一意旨,总体上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了实施。在农业发展上,政府也努力发挥积极作用,比如设立主管农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在地方上设立农会,开办农业学堂,等等。不论成效如何,但这些现代化的努力是明确的。同时,这

① “家庭农场”在目前中国农业发展实践层面,仍需要明确的界定。因为被认定为家庭农场,就能获得政策扶持,比如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土地平整、水利建设等项目支持。所以在管理经营层面,目前提出的“家庭农场”,是指经政府职能部门认定资质的经营主体,是狭义的。这些被认定为“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截至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87.7万个。而本书中的“农场”、“家庭农场”概念,是广义的,即一般农业经济学中的定义。

② [美]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③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

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调查、统计资料,便于研究者深入开展研究。选择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地区具备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发达、土地市场比较成熟、劳动力身份自由。李伯重先生认为,“从宋代以来这个地区的‘斯密型发展’,也就是商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斯密型经济成长在江南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这又是近代早期世界最先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选择这个地方进行研究,可将其与世界其他发达地区进行比较”。^①但长三角地区农业在这一时期,最终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所以,选择这一历史时段的这一地区做研究,既有助于揭示农业现代化转型中政府干预和市场的关系,也能剖析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各种阻碍因素。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对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地位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影响着农业政策的制定,也妨碍对制约农业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的正确认识。

一部分学者认为农业是工业化的包袱,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因此乡村的衰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派经济学家严厉地批评政府保护农业的做法,认为:“政府应尽力去阻止(当然从不去开展)那些大幅度降低社会上任何特别群体福利的活动”这一原则是无效率的、不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原则“隐含的假设是,现状是正在考虑政策的一种可行性替代方案”^②(即重视现状,不求发展——引

① 《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文汇学人》第136期,《文汇报》2014年1月6日第9版。

② A. J. 雷纳、D. 科尔曼主编,唐忠、孔祥智译:《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者);为了避免农产品价格不确定性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上讲是不合算的,政府平时为了粮食安全、战略安全所耗费的投入,远远超过了在偶尔遇到粮食危险时所需要的耗费。这派经济学家对农业受到特别的重视感到不满,认为这是由于“公众对农业边际单位价值的错误看法和文化上对农耕的认可”。^①对农业进行盲目的保护,会破坏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这点是没有疑义的。“一般说来,对于农业部门,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价格保护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则实行的是重税政策”,“这两种政策从全世界福利的角度来看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②

但落后国家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实际上曾经走的是一条牺牲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些国家中,农产品的价格、农业投入的价格、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所组成的价格制度是无效率的。农民从价格制度中寻找不到经济机会。政府不但没有保护农业,反而在剥夺农业的生产剩余。舒尔茨对此进行了杰出的研究,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农业像工业一样是经济的重要部门,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重工抑农的政策不会使经济现代化,反而使经济更加落后贫穷。^③我使用了舒尔茨的“价格制度”概念,分析市场价格对近现代长三角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基本上近现代长三角地区农民面临的是无效率的价格制度,农民从市场中寻找不到足够的机会。也就是说,不合理的价格制度是阻碍长三角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第 21 页。

② [美] M. D. 贝尔、E. 鲁茨:《农产品价格的歪曲及其影响:国际的比较》,《农业经济译丛》,1984 年第 2 辑,农业出版社,1985 年,第 71 页。

③ [美] 西奥多·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年,第 3—12 页。

在接受舒尔茨“价格制度”概念、科技能带来新的经济机会的理论的同时,我不赞同他认为落后国家农业并没有严重的劳力过剩压力的说法。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虽然落后但是有效率的,不可能通过现有资源的再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正确的观点,但人口的增长会导致田场的人地关系日益紧张,每个劳动力的可分配物减少,即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下降。从农业中撤出一部分劳动力虽然不能使生产率提高,但会使劳力从不充分就业状态向充分就业状态转变,劳力的报酬也会提高。中国农业要实现现代化的目的,生产中引进科技因素是必须的,关于这点舒尔茨的观点完全正确,因为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能改变既定自然资源(土地)上劳力和资本追加效益递减的情况。但只要单位耕地上的农业人口仍在增加,中国的农业生产就无法长期避免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点的来临。何炳棣先生认为,“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无法长期避免农业达到报酬递减点”。^① 这是正视中国人口压力的科学论断。所以,中国农业的发展,除了引进科学因素、进一步提高集约水平之外,减少农业劳动力也是必要的措施。当然,前面提到的给予农民应该得到的合理的有效率的价格制度也是农业发展的前提。

我使用“过密化”概念,分析人口增长对农业生产的压力;使用“价格制度”,强调农场所面临的不利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前的研究者有的强调人口的作用(如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或者认为人口增长对生产农业生产造成沉重压力),有的强调市场的作用(如肯定商业化、外来冲击的积极意义,或者关注外来资本、商业资本的掠夺性),但对家庭农场在“过密化”背景下如何对市场作出反应

①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93 页。